

常州词派地域拓展初探

——兼说清代词派地域拓展的研究

范松义

【提要】地域拓展是清代词派演变的一个重要层面。就常州词派而言,其始基于特定地域,后拓展至皖、浙、两广等地,成为全国性的词派。从文学地理的角度看,常派的嬗变就是不断进行地域拓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不同地区又有不同,应注意特殊性与具体情况。对此考察,有助于对常派更为全面、准确的把握。在对清代词派的研究中,我们应将“时”、“地”结合,既考察其历史演变,也探究其地理空间的拓展。

【关键词】清代 常州词派 地域拓展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4)02-0096-05

在清词史上,词派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现象。清代词派的发展实际上有两个维度:既有时间维度,即纵向的历史演变;又有空间维度,即横向的地理演变。既然如此,研究中就应该同时关注纵向的时间轴与横向的地域轴这两条轴线。现在关于清代词派演变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就研究模式看,更多的还是从“时”的角度着眼,较为重视其发生、发展的时间脉络,却忽视了“地”的视角,对其地理空间上传播、扩散的演变关注不多。

从空间拓展的角度看,清代词派的状况并不一致。有些词派,其发生、发展始终在某一特定区域,是纯粹的郡邑词派。而有些词派开始固为郡邑词派,以后则一步步向外拓展,融入了大批其他地域的成员,逐渐演化为全国性的流派。对于这样的词派,很显然我们有必要从文学地理的角度切入,探究其地域拓展过程,这有助于对其演变全面、准确的认识。这方面有不少问题值得深入思考。比如说,某一流派在某一地区形成以后,如何开始拓展?波及了哪些区域?何时波及这些区域?影

响力度有多大?在这些区域,该词派的发展状况如何?这些探究将进一步拓宽清代词派的研究空间,深化我们对清代词派的认知。

在研究中,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对各个词派的地域拓展情况一一进行细致的分析。清词流派较多,情况极为复杂,若欲考察词派的地域拓展,就需一点点做起,对不同词派在不同区域的嬗变都加以研析。有了扎实的个案研究,宏观的把握自然水到渠成。下面以在清代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常州词派为对象,来对其地域拓展问题进行初步的研究。

二

常州词派形成于嘉庆年间,初期成员主要由常州词人组成,包括词派创立者张惠言,其弟张琦,其友左辅、恽敬、钱季重、李兆洛、丁履恒、陆继辂。另外又有张惠言的弟子金应珮、金式玉以及郑伦元,为安徽歙县人。可以看到,当时常派成员局限在一个小圈子内,地域性较为明显。

道光以后,常州词派影响越来越大,后成为清词之主流。而常派在地理空间上拓展的情况到底如何呢?前

贤今哲曾有论述。龙榆生先生说：“迨张氏《词选》刊行之后，户诵家弦，……前后百数十年间，海内倚声，莫不沾溉余馥，以飞声于当世，其不为常州所笼罩者盖鲜矣！”^①朱德慈也认为常派在周济之后“冲出常州，走向全国”，“咸、同间遂风靡天下”，^②常州词派逐渐演化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词学流派，拓展区域极广，这毋庸置疑。但是，所谓词坛“不为常州所笼罩者盖鲜”、常派“冲出常州，走向全国”毕竟只是概括言之，失之简单。另外，龙榆生还有如下论述：“（常州词派）由常而歙，由江南而北被燕都，更由京朝士大夫之闻风景从，南传岭表，波靡两浙。”^③这里倒是勾勒出了常派地理演变的一个大体轨迹，显出龙氏开阔的学术视野。但可惜的是，这仍然只是粗略而论，龙氏尚未详细展开。

另外，检严迪昌《清词史》、赵伯陶《张惠言暨常州派词传》、朱德慈《常州词派通论》、迟宝东《常州词派与晚清词风》等著作以及相关论文，所论及的常派中后期的成员以江苏词人为多，其中常州的有蒋学沂、周济、董士锡、刘逢禄、周青、董毅、张曜孙、沈昌宇、蒋春霖，江苏其他地方的有王曦、汤成烈、宋翔凤、端木采、蒋敦复、许宗衡、庄棫、冯煦、陈廷焯、潘增玮等。浙江词人有张炳堃、谭献、朱祖谋等。其他地域的常派词人，则有广西的王拯、王鹏运、况周颐，辽宁的郑文焯，广东的陈洵、张德瀛等。

由此来看，现有研究还存在明显不足。

一方面，从地域上说，考察重心主要在江苏，范围还较窄。江苏本是清词绝对中心，词人最多，且是常州词派发源地，其中多常派词人乃应有之义。研究重心落在江苏籍词人身上，符合清词发展之实际。在对常派进行基本的梳理与宏观的把握时，以其核心与主流为主，自然是合理的、必要的。但也必须认识到，这样做还不够，我们不能满足于此。事实上，江苏以外常派词人还有不少。

另一方面，学者们并非有意识地去对词派的地域拓展进行专门探讨。从成员的籍贯看，相关成果涉及广西、广东、辽宁等地词人，似乎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常派在其他地域的发展。但实际上这些词人之所以引起关注，乃因其特殊的词学成就。王拯、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陈洵皆为词学名家，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且名列“晚清四大家”。张德瀛词作成就不高，名气不大，但其《词征》一书有助于考察晚近词坛，是以也被提及。可见，研究者并没有主动的、有意识的对常派的地域拓展情况进行探究。

应当说，对常派这样影响巨大的词派，理应作更深层次的探讨，最大限度的对其进行全面、细致地考察。常派的拓展状况与传播轨迹到底如何，这方面的探讨远

远不够，不能不说是一个缺失。

大致说来，前期的常派，主要在江苏发展，兼有安徽。后期除了江、皖、京、粤、桂、湘等地也显得愈发重要。当然，这只是一种大体的归纳，过于笼统。若进行更为具体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常派的地域拓展存在地域差异。有些区域受常派影响较大，有些则较小；有些地区接受常派较早，有些则较晚。我们不能忽视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with 具体情况，不可一概而论。如龙榆生先生说常派“由常而歙”、“北被燕都”、“南传岭表，波靡两浙”，而其影响安徽、北京、两广、浙江的时间和力度等等其实都有不同。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应对常派在不同地域的拓展逐一进行考察，在这样的基础上，常派的整体拓展状况方能明了。反之，若没有细致的考察，我们实际上无法说明常派的地域拓展是如何一种状况。如果硬要进行整体的概括，试图得出宏观的结论，自然挂一漏万，必然空洞粗疏。所以说，这方面的研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应该进行细致入微的梳理，不断进行积累，这对学术的发展更有裨益。基于这种考虑，也因为篇幅所限，这里不能展开，笔者仅选取词人总数占清代第四位的广东为例，探讨常派在当地的发展，以小见大，来对本问题进行初步尝试。

三

广东地处南疆，远离当时的文化中心，因此岭南词有独特的发展轨迹与鲜明的地域特色。^④不过岭南词坛并不孤立，而是经常与岭外进行互动。岭外的常派词人与岭南词人之间，多有联系。这种词学交流自然会对岭南词人之词学倾向产生积极影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常州词风得以流传于岭南。^⑤

（一）咸、同年间常州词派对岭南词坛的初步影响

如上所云，常州词派创于嘉庆朝，道光之后逐渐兴盛。而岭南词人开始接受常派之词学理念，却晚至咸、同年间。“粤东三家”之一汪琮即是如此。汪氏于词宗奉浙派，但他词学观念又较为通达。陈良玉《随山馆词

① 龙榆生：《论常州词派》，《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87~388页。

② 朱德慈：《常州词派通论》，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30页。

③ 龙榆生：《论常州词派》，《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87页。

④ 范松义：《论清词对词境的开拓——以清代岭南词为个案》，《学术论坛》2010年第1期。

⑤ 范松义：《论清词中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以江浙对广东的影响为个案》，《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

序》中引有汪琬论词之语：

词者，诗之余也。诗缘情而绮靡，惟词亦然，必先有缠绵婉挚之情，而后有悱恻芬芳之作。情之所至，文自生焉，清空可也，涩亦可也。

“清空”即浙西词派的审美理想，“涩”则是常州词派的词学观。对两者并不厚此薄彼，可见他对常派也是肯定的。

如果说汪琬还仅仅停留在观念上，叶衍兰则更进一步，如冒广生所谓是“刻意梦窗”，其创作受常派影响甚深。^①试看叶氏悼念亡姬的《洞仙歌》：“飞鸾镜冷，记私携翠袖。暮地妆台已分手。想重泉今夜，落月弯环，应似我、凄寂黄昏时候。玳梁栖宿并，第一难忘，仙枕余芬袞金缕。鸳瓦玉霜寒，茗火煎愁，总难熨、几重眉皱。除梦里、重逢说相思，奈梦醒、依然兰缸孤守。”词藻秾艳而密丽，词境深幽，是典型的梦窗词风。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岭南词坛之主流乃是浙西词风，但汪琬已开始肯定常派之理念，叶衍兰的创作更是走常派一路，说明岭南词风已经开始了悄悄的嬗变。

（二）光绪年间岭南词风由“浙”至“常”的转换

由上文可知，咸、同年间岭南词坛“浙”、“常”词风的消长已经开始。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当时宗常派者还只是个体现象，而至光绪年间常派的影响才开始变大。比如黄炳堃的创作经历即典型的体现出光绪年间岭南词风的变化。崔师贯曾论及黄炳堃的作词经历：

中岁始为词，用力甚勤。初犹囿于浙派，盖时尚使然。既而趋龟溪、玉笥、草窗，町畦自辟，洵为豪杰之士矣。^②

黄氏的“中岁”在光绪初年。黄氏“初犹囿于浙派”，是因岭南当时浙西词风尚未消退，“盖时尚使然”，但后来又学习王沂孙（号玉笥）、周密（号草窗）等常州词派极为推崇的词人，可见其已趋向常派。

另外，从词学思想上看，此期岭南词人对常派之理论也有应和。如张德瀛《词征》卷1云：

词与辞通，亦作词。《周易》孟氏章句曰：意内而言外也，释文沿之。小徐《说文系传》曰：音内而言外也，韵会沿之。言发于意，意为之主，故曰意内。言宣于音，音为之倡，故曰音内。其旨同矣。

张惠言《词选序》引用许慎《说文解字》中“意内而言外谓之词”之语，张德瀛对此是赞同的，同时他又进一

步考证了“意内而言外”的最早出处。另外该书卷6评鹭嘉道以还词人，却向上追溯到张惠言，以其为首，对《词选》附录的常州词人也多有评论，其词学观明显是倾向常派的。另外，梁煦南也认为“美人香草，安知非寄托之词”，^③这显然也是常派论词之观点，亦可见当时词学之趋向。

（三）清末民初岭南籍常派名家

总的来说，从光绪中期开始，岭南常州词风已渐成主流。从此直至清末民初，岭南词人大多为常派牢笼。诸家宗奉周邦彦、吴文英等，词作多有寄托，体现出典型的常派家法。这些词人不能尽举，下面拈其中成就较大者略作论述，以见当时岭南词风之一斑。

（1）沈宗畸、梁鼎芬与曾习经

就词风来说，三家都可以“丽”评之，但沈词婉丽，梁词清丽，而曾词则是艳丽，可谓同中有异。

沈宗畸词多写离别相思、春恨秋愁，词情真切，词风绮而不靡。沈氏有些词有言外意，如《蝶恋花·乙卯秋日与邕威》云：“决绝春前成隔世。独茧抽丝，直怎恹恹地。翻羨秋花辞病蒂，停辛伫苦韶光费。”乙卯即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从词意看是怀恋清朝而作，“独茧抽丝”是“隔世”的具象化。

梁鼎芬词常运用香草美人的手法，情深而意厚。在抒写宦海浮沉的作品中，这种特色甚是明显。《台城路》写赏荷，作于被贬后，上片云：“片云吹坠游仙景。凉风一池初定。秋意萧疏，花枝眷恋，别有幽怀谁省。斜阳正永。看水际盈盈，素衣齐整。绝笑莲娃，歌声乱落到烟艇。”“花枝眷恋”云云，实写词人对君王的眷恋之意。

曾习经词中最多的就是闺思情爱之作，缠绵悱恻，绮丽香艳。同时，其中也多有言外意，不同于一般的艳词。一些感慨时事的作品的寄托之意是显豁的。比如《眼儿媚》一词云：“西风吹叶下庭心。人去戍云深。金微残梦，玉关新恨，昨夜霜砧。”貌似写思妇怀念征人，但联系当时的形势，作者所指乃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不少维新志士或被杀或流放的政治现实。

（2）词风刚柔并济的梁启超、潘之博与麦孟华

梁启超、潘之博与麦孟华三人之词皆刚柔并济，较为吻合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所提出的“问涂

① 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79页。

② 崔师贯：《希古堂词存序》，黄炳堃《希古堂词存》，民国刊本。

③ 梁煦南：《三洲渔笛谱自序》，梁煦南：《三洲渔笛谱》，清刊本。

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的理念。

关于梁启超词，有论者认为梁词“慷慨激昂，沉哀悲壮，百念不摧，盖能绝去喧嚣而以辛陈为骨者”，^① 所说大体不差。同时启超词另有学周邦彦的一面。如《六丑》上片云：“听彻宵残雨，正帘外、晓寒衣薄。莫道春归，便浓春池阁，已自萧索。问岁华深浅，恹恹桃叶，在旧时阑角。繁红斗尽无人觉。待解寻芳，东风已恶。欢期未分零落。尚曲墙扶绕，频动春酌。”此词深得清真词神理。不过，周氏原作只是伤春惜花，而启超之词则别有寄托。东风狂烈，桃花凋零，这其实是时事之象征。词中一再抒发的留春之意，当然也另有所指。

潘之博本非寻常儒生，其忧心国事，但又壮志难酬。钱仲联认为潘之博是“伤心人自别有怀抱”。^② 如《蝶恋花》云：“耽搁闲愁知几许。半晌春情，偏是留难住。百草千花劳细数。江南只有相思树。”“春情”是国势之象征，留春即是欲挽回时势。词意很清楚，但作者不明白说出，而是借物象来表达，这正是常州词派所提倡的“寄托”手法。

麦孟华词中有豪健之制，风骨刚劲，不过所占比重较小。其词之主调，如康有为《粤两生集序》所云是“绵丽沉郁”。如其《蝶恋花》云：“庭院悒悒人悄悄。减了腰围，添了闲烦恼。绿遍阶苔人不到。恹恹春恨谁知道。起拨熏炉寒料峭。愿作炉烟，出入君怀抱。镜里朱颜看易老。相思盼断红心草。”“君”实指清帝，思妇则是指麦氏自己，孟华词中这种寄托手法运用极多。

(3) 力学梦窗的陈洵、易孺与杨玉衔

陈洵、易孺与杨玉衔词力学梦窗，当时皆负词名。

陈洵曾说“吾年三十，始学为词。读周氏《四家词选》，即欲从事于美成”，^③ 可见其受常派影响甚深，周济《宋四家词选》乃是引其入门之书。从词风来看，陈洵早期词力学梦窗，风格秾丽绵密。比如《渡江云·闭门春尽，兀坐成吟》云：“钩帘喧喧燕，絮风正急，忍问抱愁归。绣尘摇梦短，几处垂杨，水曲暗鹃啼。闲心漫理，怕尚有、一点芳菲。刚凭得、绝尘书幌，绕树绿成围。凄迷。单杯婪尾，小字蛮笺，更安排何计。空怨他、高楼银烛，催送斜晖。今宵泪到云屏隙，只断钟、疏鼓休提。人静后，和春泥语低低。”后陈洵渐参清真词之格调，词风较为沉厚浑融。

关于易孺，龙榆生曾说：“孺填词务为生涩。爱取周、吴诸僻调，一一依其四声虚实而强填之，用心至苦。自谓‘百涩词心不要通’云。遗制《和玉田词》一卷，渐趋疏隽。”^④ 兹录其《霜花映·九日浦江园》上片：“怨潮暮咽，对莽苍迢迢，剩写心枯。衰草烟冥，碧天云皱，秋花未引清娱。乱蓬已疏，奈泪深、先沐茱萸。怕残蝉、做足销凝，梦凄声晚渺寒芜。”

杨玉衔当时亦以学吴文英词知名，夏敬观谓其词造诣极精深，“力避凡近”，^⑤ 评价甚高。大体而言，玉衔词苍凉幽凄，得梦窗词之密而舍其丽，同时又不一味求深求涩。此处节录其《霜叶飞·己巳重九，游江湾叶氏园，和梦窗韵》：“乱丝情绪，拼抛却、无端如挂秋树。斜阳窥堞意阑珊，愁酿西风雨。梦半醒、飘零倦羽。云山空隔芜城古。怕更倚危栏，菊讯探、江皋指点，冷烟横素。”

四

据上面的个案分析可以看到，对清代词派的地域拓展进行考察实有重要价值。像常州词派从咸、同年间即开始对广东词坛产生影响，清末民初粤籍常派词人更是成群出现。其中虽然没有张惠言、周济、朱祖谋这样的巨匠，但不乏名家。钱仲联先生撰《近百年词坛点将录》，上面所论沈宗畸、梁鼎芬、曾习经、梁启超、潘之博、麦孟华、杨玉衔、易孺、陈洵诸家悉数入选。这些词人在清词史上绝非默默无闻、可有可无者，但除了梁启超、陈洵较受关注外，关于其他词人的研究极少。甚至论常派者，即使对于梁、陈的关注也仍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进一步说，常派在其他地域的发展又怎么样呢？比如龙榆生先生提到的安徽、北京、浙江等地的状况如何？同时，龙氏未曾提到的一些区域，常派是否有流风余韵？如有，情况又怎么样？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尚有大量的空白点需要填充。由此可以看出，如欲对常派的发展演变有全面而细致的把握，确有必要对其地域拓展情况作深入考察。

另外我们还可知道，词派在不同地域的发展并不同步。像常州词派在不同的地理空间虽然都有发展，但在各区域产生影响的时间却并不共时。常派兴起之后，最先产生影响的是江苏，然后才是其他区域，这中间就有时间的错位。像岭南直至咸、同年间方有极少数词人开始接受常派，而到光绪年间才普遍的认同常州词风，这距离常派的兴起已有几十年了。由此可见，前引朱德慈

① 沈轶刘、富寿荪编《清词菁华》，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87页。

② 钱仲联：《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当代学者自选文库：钱仲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00页。

③ 陈洵：《海绡说词》，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39页。

④ 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09页。

⑤ 夏敬观：《忍古楼词话》，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84页。

认为常派“咸、同间遂风靡天下”，^①并不完全准确，常派当时恐不能说是已经牢笼天下。这种情况之出现，是因为其他地区远离清词之中心，而词风的拓展与辐射需要时间与过程，因此常派在各区域间的发展不可能同步。这种错位现象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只是不同区域间的错位又各有具体情况，存在地域差异。

从这种错位现象也就可以发现，清代词派的地域板块构成其实是动态的，并非一成不变。比如我们习惯上说某一时段常州词派如何如何，而如果结合地域的视角，就可以发现当时常派实际上是在某一特定地域发展的。而在另一时期，这个地域范围则可能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常派固然是全国性的词派，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地域构成是不同的。这种板块构成变化，其实也从特定的角度体现出常派的历史进程。明白了这点，我们再看龙榆生先生“前后百数十年间，海内倚声，莫不沾溉余馥，以飞声于当世，其不为常州所笼罩者盖鲜矣”^②这样的论断，就知道只是在一定的时段方能成立，盖因某些时期常派并不能够牢笼全国。由此来看，地域视角是可以给我们新的启发的。

五

上文主要是以常州词派为例，对清代词派地域拓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自然，词派的地域拓展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并非只有常派这样。常派之外，如云间、阳羨、浙西词派，其中也有邑外之人，也需要加以深入研究。如阳羨词派，今天学界已经注意到除了江苏宜兴，在河南也有同道。而笔者发现，其他地域也还有崇奉阳羨词风者。至于浙西词派，影响更是巨大，只不过我们对其地域拓展的问题往往不加以深究。比如乾隆年间，彭兆荪描述当时词风云：“家祝姜张，户户朱厉。”^③晚清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中还说：“雍正、乾隆间，词学奉樊榭为赤帜，家白石而户梅溪矣。”指

出当时人崇奉浙派代表人物朱彝尊、厉鹗，并以浙派所树典型姜夔、张炎、史达祖为楷模。这两则材料常被作为浙派牢笼词坛的证明。但这种论断到底什么情况下方才适用？他们所说的“家”、“户”所指到底为何？是普天之下皆如此呢，还是仅在某一地域呈现出如此景象？同时，两人所说是雍、乾年间，那么以后浙派地域拓展的情况又怎样？这些问题也值得深思。

总体而言，对于清代的一些全国性词派，要考察其历史演变，也要探究其地理空间的拓展情况。我们应该将时间与空间坐标结合起来，进行立体的考察，改变过去平面化的研究模式。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一些词派的地域分布、发展轨迹、传播状况如何，应该专门加以探讨。由此出发，我们对清代词派自然会有新的认识，会更加贴近其本质，从而推进清代词派的研究。进一步说，这也是对清代词史的更为具体、深入的探索。应当说，这是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本文的一些思考，或对清词的研究不为无助。

本文得到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地域文化与清词的嬗变研究》(2013YBWX08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清词地域性研究》(11YJA751012)资助

本文作者：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2006届博士
责任编辑：马光

① 朱德慈：《常州词派通论》，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30页。

② 龙榆生：《论常州词派》，《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87~388页。

③ 彭兆荪：《小谟觞馆诗余序》，《小谟觞馆诗余》，《清名家词》本，上海书店1982年版。

O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Changzhou Ci School

—Also on the Research of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Ci School in the Qing Dynasty

Fan Songyi

Abstract: Regional development wa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i School in the Qing Dynasty. As for the Changzhou Ci School, its scope of its activities expanded from specific region to Anhui, Zhejiang, Guangdong, and Guangxi. It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 national scho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the development of Changzhou Ci School was the constant expansion of the scope. This process wa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particularity and the specific situation in research.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we could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it. On the research of Ci School in the Qing Dynasty, we should study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explore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Qing Dynasty; the Changzhou Ci School; region development